

谁在规划城市？“权力审美”是对城市的一种破坏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14/2021_2022__E8_B0_81_E5_9C_A8_E8_A7_84_E5_c57_614473.htm

城市建设为什么会患

“流行病”当前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不切实际、盲目跟风，追根溯源，病因无外乎以下3点：(1)急功近利。因为城市建设是形象和政绩的集中表现，所以，不少干部走马上任之后，便在“改变城市面貌”上大动脑筋。“一个书记一条街，一任县长一座城”的现象便由此而生。那些干部不从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好大喜功、贪大求洋、急功近利。在城市建设的决策中，他们缺乏长远目光，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往往给城市建设留下“败笔”。(2)规划滞后。“首长频频换，规划跟着变。城市‘四不像’，群众有意见。”这种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被丢弃，从而出现了“人民城市一人建”的怪现象。在城市建设中，有的城市旧城改造还没有完成，新建部分又要加以改造。(3)恶性竞争。一些城市建设的决策者看不到城市之间联合协调的必然趋势，不是主动联合，而是恶性竞争，不协调发展，光作表面文章。最典型的要数当前的“摩天大楼热”。例如上海将在浦东陆家嘴建成高度为466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夺取“世界第一”的桂冠。建筑界人士认为：高度一旦超过300米，在庞大的维护管理费用前，摩天大楼便已经失去了节约用地的经济意义。这样的竞争，不免有满足虚荣心之嫌。“权力审美”是一种破坏针对我国城市规划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长官意志造成的“权力审美”是对规划最大的破坏。有的领导者角色错位，包揽了

规划师、建筑师的活儿，连建筑的色彩都要自己来定。有的领导人光注意细节，但不懂得超越细节。作为掌舵者，如果在细节上和建筑师、文化人争夺地盘，就容易产生长官意志，就变成“权力审美”了。一些城市的领导人为了使体现其个人意志的规划得以通过，就有选择地找若干专家，像风景区规划的会审就找旅游专家来，自然很容易就通过了。仇保兴说，由于“权力审美”，审批程序上的“可行性研究”往往变成了“可批性研究”。现在，许多有争议的建筑设计，虽由建筑师绘制，但其设计要求却是来源于某些领导人的想法。针对这些问题，建设部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制度约束。我国以往对领导人强调自律，但缺乏制度上的约束。只有制度上文明，才能遏制个人的不文明，才能使得城市文明起来。城市规划建设跟其它的商品不一样，它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规划建设中有许多技术性的问题，一般的老百姓要理解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城市要组织一个专家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员会的论证讨论是开放的，可以邀请记者参加。他说，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专家的争论、讨论的意见还可以再让老百姓进行分辨，这样就能帮助老百姓解决不对称的问题。现在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都需要公众的参加，因为城市是全体市民的城市。到底如何根治形象工程？仇保兴说，在城市建设和规划过程中，要建立正确的评价体系。城市规划建设得好有什么标准？书记、市长当得好有什么标准？不是凭少数人说面貌变化很大，或者说“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就可以的。如果光是从这种求变的心理出发，就容易导致“形象工程”。他认为，要把正确的城市评价体系建立起来，把各级领导的注意力引导

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上来，从地面引导到地下，从形象工程引导到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来。他建议，现在各级政府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必须向人们公布，公布以后再通过政府决策，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当地人大决策。这样可以使公众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以及舆论的监督能够结合起来。城市规划与理想无关郑筱津的工作在很多人的想像中是带着梦幻色彩的设计一座城。作为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所所长，郑筱津的手里总有三、四座城市的规划任务在同时做着，而一个城市的初步规划要做下来至少得在两年以上。但对郑筱津来说，她的工作却和浪漫的城市理想毫不沾边。因为，很多时候都要与各个方面不断地“拉锯”。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当地领导的贪大思想是最常遇到的问题，一个城市明明只有50万人口，却偏要按照200万人口来做规划。这个时候，郑筱津她们总要尽最大努力进行解释和说服，这种说服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奏效的。但在局部的问题上，妥协的一方就通常是规划师了。郑筱津记得，有一次，在一座西北内陆城市讨论绿化植物的选择时，市领导坚持大面积引进并不适宜本地生长的樱花，结果是种了很多，也死了很多。并不是规划中的所有分歧都能在最后时分达成妥协，郑筱津也曾经为此丢过项目。在为南方某城做路网规划时，郑筱津曾与当地一把手产生了强烈的分歧。这座城市中有一座革命纪念碑，当地领导想要以这座纪念碑为中心，模仿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结构，布置全市的交通干线。而郑筱津和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路网结构的可行性很差。经过很长时间的沟通，双方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后退半步。最后，郑筱津她们只能退出了项目，由另一家规

划院接手。周榕曾经兼职在山西某市担任市长助理及总规划师，在那里，除了一样的身不由己，他体会到的还有强烈的孤独。有一次，周榕为下属一个县做商业街规划。规划区域内有一段明代城墙，周榕沿城墙设计了绿化带，而区领导坚持要沿墙做成商铺。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市长介入了，但区领导的决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商铺建起来了，城墙被完全遮住了。还有一次，周榕发现规划地区中，有一段几百米长的北齐残城。周榕去和区内的主管领导谈绕开城墙的问题，刚一开口，这位处级干部就误解了周榕的意思，连忙安慰周不要发愁，“这好办啊，找个推土机来一夜就推平了它。”周榕连忙解释他是想保存这段墙以及墙的历史价值。最后，领导点头了：“行，那就留下吧。”然而，工程交到开发商手里之后，周榕设计建筑的颜色和式样不断被篡改，以至改到面目全非。项目完成后，周榕怕去现场，更不敢承认那是自己的作品。“做城市规划的人，本应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工作两三年后，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就被磨去了一半。如果他还想吃这口饭的话，五年之内，一定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妥协论者。”周榕这样比喻：“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

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